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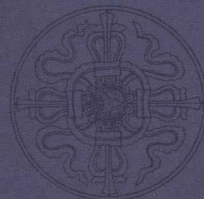
汉语副词研究丛书

主编：唐贤清

主审：蒋冀骋

《三言》副词研究

◎张振羽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言》副词研究 / 张振羽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 - 7 - 5648 - 0690 - 3

I. ①三… II. ①张… III. ①三言一副词—研究 IV. ①H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7290 号

《三言》副词研究

张振羽 著

◇责任编辑: 何海龙 欧继花

◇责任校对: 胡晓军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853867 88872751, 传真/0731. 88872636

网址/http://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市宏发印刷厂

◇开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张: 20. 5

◇字数: 367 千字

◇版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648 - 0690 - 3

◇定价: 38. 00 元

序

任何研究都要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问题。是什么解决本质问题，为什么解决理据问题，怎么样解决分布和作用问题。

副词研究也是如此。

任何一个陈述句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组成：陈述对象和陈述对象的状态。陈述对象由名词充当，陈述对象的状态由形容词和动词充当。就汉语而言，名词是表示名物的词，动词是表示动作的词，形容词是表示性质和特征的词。这些都是句子构成的主件，是词汇中的主体。没有主体不行，只有主体也不行。没有主体，不知说什么，不知说谁；只有主体，语义的精微处无法表达，所以还得有别的词类来参与句子的构成，如动作的时间、范围、程度、频率、方式，性质和特征的程度、情态，动词、形容词自身难以表达，故还得需要别的词来帮助。这些修饰动词和形容词的词，英语叫“adverb”，“verb”是动词的意思，“ad”是表示增加意义的前缀，加在动词（verb）的上面就是对动词（verb）进行修饰、限定。adverb从不充当句子的主要成分，在句子中不起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只起辅助的作用，做附加的成分，故汉语的语言工作者用“副词”来翻译它，也算是很贴切的了。

这是解决副词是什么的问题。任何事物都是在是什么、不是什么中确定其本质的。就研究者而言，只研究副词是什么还不够，还得探讨什么不是副词。所谓“探讨什么不是副词”，实际上就是探讨副词与其他词类的边界。对有形态变化的语言来说，这不是个问题，或者问题不大，对汉语这种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来说，问题就来了。如果说，修饰动词、形容词就是副词，汉语里名词、动词、形容词皆可修饰动词，这就导致边界不清，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空间，论文题目就出来了。

副词本质和特征的研究解决是什么的问题。

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还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即为什么它是副词，它一产生就是副词吗，如果不是，它是怎么来的。有人说是形容词、动词虚化的结果。问题是，为什么它能虚化而别的形容词、动词不能虚化？这

又涉及到形成的机制问题。对这些形成机制的研究，又产生了不少博士论文。目前学界较一致的意见是：语义基础、句法位置、语用推理和认知心理的共同作用是动词、形容词变为副词的主要条件。

所谓机制，就是满足这些基本条件就会自动产生变化。目前学界在溯源、明变、探理、究因等方面已做了较深入的研究，并且很有成绩。但这种研究大多是从现有副词中选取部分词条来进行的，并未将意义相同、句法位置相同、语用条件相同的动词、形容词进行动态的探流式研究，即在相同的条件下，它们是否朝相同的方面演变。如果演变方向不一致，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不一致；如果一致，我们所说的形成机制才是真正的机制，否则这个机制还值得怀疑。尽善矣，未必尽美。

这些研究属于为什么的范畴。

此外还要研究“怎么样”，即如何使用、起什么作用等等。

张振羽君从余习近代汉语三年，以《三言》的副词作为研究对象。《三言》有较浓的吴方言色彩，对于不以吴语为母语的张君来说，研究起来，有一定困难。但他知难而进，细心探究，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诸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毕业后，继续修订，以图完善。今将付梓，定将推进近代汉语副词的深入研究，亦一盛事。

学无止境。我所说的“学”，不只是读书，读书是学，但不是唯一的学，也不是最重要的学。说文云：学，觉悟也。怎样才能觉悟？靠思考。思考有所得，产生觉悟。觉者，醒也，从懵懂中醒来；悟者，明也，从黑洞中走出。这种觉悟就是思想。对于一般人来说，读书就是学。将读书作为一种习惯，通过读书修心养性，寄托情思，收放心，降欲火，善之善也。对于学者来说，读书是学，思考是更重要的学。没有思考的学，则被人牵着鼻子走，无所适从，更不能创新，故孔夫子说：“学而不思则罔。”作为学者，主要在于思，而不在于读。中国的人文学者，读书多，思考少。故只有学，没有问。既不敢问，也不想问，更不能问，还不会问。近代来，中国学人对人类社会知识的贡献实在有限，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只学不问。

多问，多质疑，多批判，才能推进学术进步，振羽其勉之。

是为序。

蒋冀骋

于湖南师范大学无知斋

2012. 2. 29

目 录

绪论	001
一 关于副词	001
二 近三十年来汉语副词的研究概况	004
三 《三言》的语言学研究价值及其研究情况	008
四 《三言》副词的研究意义与方法	014
五 相关问题的说明	018
第一章 《三言》的副词系统及其发展演变	021
第一节 范围副词	022
第二节 程度副词	028
第三节 时间副词	037
第四节 否定副词	055
第五节 情状方式副词	058
第六节 语气副词	071
第七节 《三言》副词系统的特点及其发展	096
第二章 《三言》副词的词义系统	106
第一节 毕竟	107
第二节 端的	110
第三节 漫	112
第四节 一发	114
第五节 一时	117
第六节 辄	119
第七节 转	121
第八节 总	124
第九节 本章小结	126

第三章 《三言》常用副词的演变兴替	127
第一节 不成 难道	127
第二节 动 动辄 动不动	131
第三节 凡 共 通共 总共	137
第四节 好生 好不 好好	143
第五节 偏 偏偏 偏生	152
第六节 尤 尤其	159
第七节 本章小结	167
第四章 《三言》方言副词的来源及其发展（上）	168
第一节 不常	169
第二节 趁常	173
第三节 大分	175
第四节 多分	179
第五节 怪见	182
第六节 好道	187
第七节 可知	193
第八节 烂	197
第九节 流水	201
第十节 难说	210
第五章 《三言》方言副词的来源及其发展（下）	214
第一节 恰正	214
第二节 生	216
第三节 特骨	223
第四节 忒也	225
第五节 一径	231
第六节 有心	234
第七节 再三再四	236
第八节 早是	240
第九节 终不然	244
第十节 做定	250
第十一节 副词词尾“则”探源	253
第十二节 本章小结	260

结语	263
一 《三言》副词系统的特点	263
二 《三言》副词词义系统的发展特点	264
三 《三言》常用副词的演变特点	264
四 《三言》方言副词形成的理论思考	264
附录 《三言》副词表	266
参考文献	291
引用书目	306
后记	312
丛书后记	314

绪论

一 关于副词

副词是汉语虚词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词类，也是汉语虚词中非常活跃和能产的一个词类。20世纪80年代以来，副词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并成为语法研究的热点。大量语法专著与论文对副词的性质、功能、定义、内部分类以及副词与相关词类的区分标准等问题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也取得了一些共识，但是“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和直接可资借鉴的国外研究成果，又由于汉语副词内部的各个成员之间因虚化程度的不同而存在着种种差异，再加上绝大多数常用副词都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研究》，2000a，2页），所以，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汉语副词的上述基本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限于学识和篇幅，我们不拟对副词的所有相关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只能就与本书有关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一）副词的特点、功能与定义

汉语中的大部分副词是由实词虚化而来的，由于各类副词虚化的先后不一，而且虚化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必然造成不同的副词次类在虚化程度上的差异。因此要回答汉语副词究竟是虚词还是实词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不仅如此，这种虚化还是一种不断发展的过程，它不仅表现为实词向副词的虚化，也表现为副词内部由较虚的次类向更虚的次类发展的趋势；并且从理论上讲，只要汉语还使用一天，实词虚化的脚步就不会停止，即便发展到现代汉语，这种进程也在悄然进行，只不过短时间内难以觉察而已。当然，伴随着新的实词的虚化，也必然会有旧的虚词的消亡，从而使虚词的总量得以保持相对的稳定。副词的数量在目前虽然可以逐一列举，但仍在不断增加，所以一般看作是半开放类词。

张谊生(2000a)的《现代汉语副词研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虚化——来看副词。他根据现代汉语副词在虚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把现代汉语副词一分为二,那些以表示词汇意义为主的描摹性副词归入概念词,那些以表示功能意义为主的限制性副词和以表示情态意义为主的评注性副词归入功能词,而不再纠缠于虚实两分(7~8页)。张谊生的这种认识,使得共时副词研究的不少疑难问题,诸如副词的虚实归属,副词的性质、功能和定义,副词与其他词类的区分,副词的多义和兼类,副词的数量和范围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原则得到很好的解释。

当然,张谊生对副词基本问题的看法只是针对现代汉语副词而言的,有些并不完全适用于古代汉语。从历时演变的观点看,我们认为汉语副词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特点:副词是一个兼有虚实词性的词类;在功能上一般只能修饰谓词性成分;每一个时代的副词系统的数量和范围都是不同的,词形相同的一个词往往在某个时期是副词,而在此前或此后却不是。总之,不同时代的副词系统的面貌都是有差异的,它是一个动态的范畴。因此,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汉语副词的基本问题——性质、范围、功能、分类、定义等,时代不同,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自然也要因时而异,不但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范围、功能、分类不同于古代汉语,即使在古代汉语内部,近代汉语副词不同于中古汉语副词,中古汉语副词也不同于上古汉语副词。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语副词有其共性,但不同时期的副词的个性更值得我们关注,譬如在现代汉语里,部分语气副词可以单独成句或独立回答问题,甚至可以充当谓语,在句法分布上具有所谓的述谓性和灵活性。张谊生(2000a)就认为现代汉语语气副词的主要功能不是充当状语和表示语气,而是充当高层谓语进行主观评注,因而他把语气副词称之为评注性副词(46页)。在我们看来,语气副词充当高层谓语的功能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汉语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衍化出来的,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在现代汉语阶段才出现的,我们在古代汉语里几乎看不到这类语言现象。再拿副词能否作补语来说,语言学界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讨论,当前学者们一般倾向于认为在现代汉语里有极少数程度副词,如“极”、“很”等,是可以充当补语的,但它们在古代汉语里是否也可以充当补语呢?杨荣祥(《近代汉语副词研究》,2005)认为,至少在近代汉语阶段,副词是不能充当补语的(24页)。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认为还可以做进一步的讨论。可见,在探讨副词的相关基本问题时,应从当时副词系统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出有针对性的阐释,而不可简单地贴一个标签了事。

自《马氏文通》以来，众多的学者都给副词下过定义，但由于理论背景的差异，他们所下的定义并不一致，往往在副词的意义和功能方面各有侧重。鉴于副词在性质和功能上的时代差异，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对副词做如下界定：在句法结构中，一般只能充当谓词性结构中的修饰成分，近代汉语以后个别还可以充当程度补语的兼有虚实词性的词类。

（二）副词的再分类

汉语副词是一个很复杂的词类。在副词内部的分类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还不尽一致。这其中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汉语副词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吕叔湘先生（《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说过：“副词的内部需要分类，可是不容易分得干净利索，因为副词本身就是个大杂烩。”（42页）二是分类的标准因人而异，不同的学者采用的标准往往各不相同，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目前学者们在对汉语副词进行内部分类时主要还是依据意义标准，这一分类法始于黎锦熙（1924）的《新著国语文法》。与此不同，朱德熙（《语法答问》，1985）认为，“根据词的意义划分词类是行不通的”，“划分词类的根据只能是词的语法功能”（10~11页）。对此，杨荣祥（2005）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朱先生的这一理论，对于确定汉语的各大词类，是合理的，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等，但要以此理论指导副词的次类划分却有困难，因为副词的语法功能就是只能处于‘状·中’结构中‘状’的位置，在这一共性的基础上，再要根据功能划分副词的次类，很难找到十分有效的依据。”（47页）当然朱德熙先生并没有完全否定意义在副词次类划分上的作用，他（《语法讲义》，1982）曾经指出：“根据语法功能分出来的类，在意义上也有一定的共同点。可见词的语法功能和意义之间有密切的联系。”（38页）反之，有共同语义特征的副词次类，在功能上也应该有一定的共同点。基于这种认识，杨荣祥（2005）认为，“划分副词次类，在没有找到单纯依据语法功能作为分类标准的条件下，可以根据语义特征来分类，但是，这样分出的次类，一定要能从功能方面得到验证。”（47页）这种做法，符合语义和功能相结合、互相补充、互为印证的副词再分类原则。我们认为，以语义为标准对副词进行再分类，不失为一种便捷的分类方法，也符合人们的语感和汉语副词的分类传统。正如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1984）所指出的：“无论用什么方法划分词类，词义是一项重要的参考标准，如果一种分类方法的结果有跟词义相冲突的地方，准保不受欢迎。”（252页）

张谊生（2000a）在谈到副词分类存在的问题时指出：“以往的副词分

类，又几乎都是以意义为标准的……迄今仍然没能取得共识和实质性的进展。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以往的归类和分类都没有将共时的差异同历时的演变结合起来。”（364页）他主张坚持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原则，根据副词的虚化程度和句法功能来为副词分类。依据这种观点，他把副词分为三类：描摹性副词、限制性副词、评注性副词。张谊生从语法化的视角来给副词分类，富有创见，但副词虚化的程度很难把握，因此操作起来不太方便。

应该承认，在对汉语副词进行分类、特别是对个别具体副词进行归类时，学者们常常会陷入一种“两可”或“两难”的境地，有时难免会存在一定的主观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副词的虚化程度不同，另一方面是因为词类本来就是一个原型范畴，词类之间的界限往往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副词次类的划分问题上，学者们的认识是越来越明确和深入了。

二 近三十年来汉语副词的研究概况

副词是虚词中数量最多的一个词类，也是内部最不均衡、个性强于共性的一个词类。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汉语副词的研究大多带有训诂学随文释义的色彩，往往只对副词做简单的词典式解释，忽视了对副词进行历时的语法研究，使人无法了解副词发展演变的轨迹。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副词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了大量论及副词的通论性语法著作和高校语言类教材之外，还出现了一系列很有特色的虚词词典与副词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副词研究也一度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但总的说来，汉语的副词至今研究得还很不充分，在诸如副词的性质、范围、分类原则等基本问题上，学者们还是难以取得相对一致的共识。

最近十年来，汉语副词研究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进展，值得关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副词的专书研究和断代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涌现出了一大批硕、博士论文和专著，如张谊生（2000a）的《现代汉语副词研究》，唐贤清（2004）的《〈朱子语类〉副词研究》，杨荣祥（2005）的《近代汉语副词研究》，葛佳才（2005）的《东汉副词系统研究》、高育花（2007）

的《中古汉语副词研究》等。学者们在进行副词的专书和断代研究时往往与前后不同历史时期的副词系统进行历时的比较，注意对副词的发展演变做历史的考察，在这一研究领域颇多创获，但总的说来这种研究还不够，整个汉语副词的轮廓还没有清晰地显现出来。

(二) 汉语副词的研究重心逐渐转移到各别副词的演变上来，副词演变的个案研究开始成为当前副词研究的热点。这说明，当前副词的研究正由静态的、平面的、单一方法的研究向动态的、点面结合的、多方法综合运用研究转变。副词是一个个性大于共性的词类，虽然不同的副词最后都殊途同归了，但是其演变途径却是千姿百态的，只有把它们的来龙去脉一个一个地弄清楚，才能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出整个副词系统发展演变的共同规律。近年来，副词演变的个案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更多的学者运用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去从事汉语副词演变的个案研究。毫无疑问，副词的个案研究有赖于副词的专书研究和断代研究为其提供基础。近几十年来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所积累的大量语法演变的事实，特别是汉语副词的专书、断代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为副词的语法化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三) 近些年来，汉语副词研究在研究途径与方法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具体说来，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普方古的结合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广泛共识。方言是古代汉语发展演变的活化石，不同的方言其实反映了古代汉语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汉语史的研究必须与方言结合起来，汉语副词的研究也是如此。汉语有着 3000 多年的文献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方言类型，因此在语法化研究方面，汉语有着其他语言所无可企及的优势，理应把普通话、现代汉语方言、古代汉语的研究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有利于扩大副词研究的范围，为副词研究注入新的活力；结合方言材料来考察副词的来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避免副词语法化研究中的主观臆断，使共同语副词的研究和方言副词的研究互为补充、互为印证，共同推进副词研究向纵深发展，而且重视副词演变在时间上和地域上的分布差别，可以使研究的结果更为精确、深入。应该说，结合方言来研究古代汉语副词来源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在方言语法史研究中对方言副词来源的研究尤显薄弱。

2. 随着西方语法化理论的引进和介绍，学者们开始致力于汉语副词的语法化研究。他们力求从汉语的实际出发，通过语言事实的发掘和描写，揭示隐藏于其中的规律和机制，从而概括出汉语副词语法化的一些原则和语言演变理论。随着汉语副词语法化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汉语副词

的虚化虽然要遵循人类语言的共同法则，可是作为一种非形态语言，汉语副词的虚化也有着自己的特点和方式。近几年来，在副词语法化研究方面，学者们发表了一批很有分量的单篇论文，如李宗江（2005）《汉语“才”类副词共同的语法化方向》，唐贤清（2005）《副词“尽底”的语法化》，张谊生（2007）的《从间接的跨层次连用到典型的程度副词——“极其”词汇化和副词化的演变历程和成熟标志》，杨荣祥（2007）《近代汉语副词“白”的释义与来源》，曹秀玲（2008）《“相当”的虚化及相关问题》，等等。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汉语副词语法化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但总的来说研究的成果还比较零散，全面地考察汉语副词语法化问题，系统地揭示汉语副词语法化的动因、机制、演化途径等基本规律的专著还没有见到。

3. 在副词语法化研究中，语言学界经历了一个由单纯运用语法化理论转而注重把语法化理论与国内外各种已经成熟的语言学理论结合起来的转变。语法化理论是一种富有解释力和操作性的当代语言学新理论，但单纯依赖语法化理论来探讨汉语副词的语法化问题，很多时候会陷于捉襟见肘的窘境。在当前的副词语法化研究中，把语法化理论与国内外已经成熟的各种语言学理论，如“两个三角”理论、认知语言学理论、语言类型学理论等结合起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以语言类型学为例，以往的副词语法化研究，学者们往往只把研究的视野局限于汉语内部，没有把汉语副词的演变置于世界语言演变的大背景下来加以考察。事实上，研究汉语副词的语法化，应该充分了解并借鉴国内外学者们所做的跨语言的研究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使所取得的成果更具普遍意义。在这个方面，吴福祥着力较多，他的《语法化演变的共相与殊相》（2005a）、《汉语语法化演变的几个类型学特征》（2005b）等论文都涉及副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特征的探讨。

当然，当前的副词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如下：

（一）在副词专书研究方面，学者们在资料的选择和使用上往往不太考虑地域因素。吕叔湘（1955）很早就提出：“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但有时间因素，也还有地域的因素，应该先就每一种材料做一番分析，然后才能进行综合。”梅祖麟（《〈朱子语类〉和休宁话的完成态“著”字》，1998）后来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地域的因素重要，是因为不同的地域可能有不同的方言，而不同的方言可能语法不同。研究语法史，最好是把资料限于同一方言的先后阶段，否则会‘错认祖宗’。”汉语文献语料往往并不是一种同质系统，与上、中古汉语相比，近代汉语语料更具明显的方言差异，某些语言现象之间的差异不一定是其自身单线条历时层

次的反映，实际起作用的有可能是地域因素，只有对文献资料中的共同语与方言成分加以明确的区分，才能进一步提高汉语史研究的科学性和结论的可信度。

(二) 在副词的语法化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1. 在研究范围上，语言学界往往局限于把方言材料作为共同语副词语法化研究的佐证，没有自觉地把方言副词的演变纳入汉语史的研究范围，存在着重共同语而轻方言的现象。方言既是历史现象，也是文化现象，是地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许多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词语（包括虚词）既反映了全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也反映了本地域特有的历史文化，它们的形成，是与各地的方言文化土壤密不可分的。因此，就汉语副词的语法化来说，我们在着力探索汉语共同语副词语法化规律的同时，也要重视汉语方言副词演变规律的揭示和总结，以不断丰富和完善语法化的理论。

2. 在研究方法上，副词的语法化研究还没有把普通话、现代汉语方言、古代汉语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存在着共同语与方言副词研究相脱离的倾向。其实，学者们早就提倡语言学内部纵横两方面的沟通，如朱德熙、邢福义、吴福祥开创的把历史语言学、方言、语法史结合起来的路子，都是很值得重视的。他们所倡导的理论以及研究的成功范例都为副词的语法化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3. 在副词的语法化研究中，学者们注意得比较多的还是结构形式、语义变化、表达方式和认知心理等方面，却忽视了语言的外部联系对副词语法化的影响，没有把语言内部结构的研究和外部联系的研究结合起来。李如龙（《汉语方言学》，2001）指出：“只有全方位的研究才能透彻地了解所研究的对象。”（155页）

4. 许多学者往往只局限于对单个副词的来源进行孤立的研究，忽视了将单个副词的来源与相关义群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变异结合起来考察。事实证明，选取某些词群（或语义场），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揭示语义在语法化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决定作用，有利于揭示语法系统的制约作用。在这个方面，有些学者做了成功的尝试，如李宗江（1999）的《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史金生（2003a）的《“毕竟”类副词的功能差异及语法化历程》，张谊生（2005）的《论与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等。

5. 汉语副词的语法化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汇语素是怎样演变为语法语素的，忽视了副词的语法化与相关语法结构的关系的探讨。我国“十五”研

究课题目录指出：“一个个虚字的个体研究以往已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而虚字与语法结构的关系的研究则还比较薄弱，需要加强。”在今后的副词语法化研究中，把副词与相关的语法结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应该是研究方法上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鉴于汉语副词的上述研究现状，我们选取明代冯梦龙的白话小说集《三言》作为语料，来研究其中的副词。我们选取《三言》副词作为考察的对象，除了个人的兴趣和研究基础等因素以外，主要是考虑到明代在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独特的地位以及《三言》鲜明的吴方言背景。我们的意图是想通过对方言副词的来源及副词的方言性新义的产生方式的系统考察，揭示方言副词及其词义系统形成与发展演变的某些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语言学界在副词研究上存在的上述不足。

三 《三言》的语言学研究价值及其研究情况

（一）冯梦龙与《三言》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吴下词奴等，长洲（今江苏苏州吴县）人，明代杰出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少有才气，博学多识，为人旷达。他自早年进学屡试不第，落魄奔走，行为放荡不羁，不受名教束缚。57岁（1631）举贡，曾任福建寿宁知县，65岁离任回苏州。科场上的失意，使冯梦龙转而投入了民间文学的大怀抱，毕生从事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工作，经他收集、改订、出版的小说、戏曲和民歌等通俗文学作品数量很多。他也从事创作，但是作品数量现在已很难统计。冯梦龙之所以热衷于通俗文学的编纂与创作，是他认为这些作品均为“天地间自然之文”（《山歌叙》）。他甚至认为小说可“与《康衢》《击壤》之歌，并传不朽”，可为“六经国史之辅”（《醒世恒言叙》）。

《三言》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话本和拟话本小说集，包括《喻世明言》（初刊时名曰《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①，每集40篇，共收120篇短篇白话小说。《三言》是冯梦龙根据宋元旧本，并参照前人

^① 为行文精练起见，《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书下文一般简称为《喻》《警》《醒》。

的野史笔记，经过整理、编辑、创作，从明代天启年间开始陆续刻印成书的。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序中说：“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书，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可见冯梦龙基本上完成了宋元话本的收集整理工作，当时流行的优秀话本差不多都被他收进《三言》了。这120篇白话小说，有的是流传已久、脍炙人口的宋元旧篇，有的是艺术纯熟、文笔畅达的明人新作，包括冯梦龙自己的创作，代表了我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的最高成就。《三言》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生动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宋元明三代城乡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社会下层多彩多姿的市井生活，“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对于《三言》的影响和刻印的初衷，衍庆堂《醒世恒言识语》是这样说的：“本坊重价购求古今通俗演义一百二十种，初刻为《喻世明言》，二刻为《警世通言》，海内均奉为邛架珍玩矣，兹三刻为《醒世恒言》。种种典实，事事奇观，总取木铎醒世之意，并前刻共成完璧云。”《三言》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元末明初的文坛曾掀起过一个短篇小说收集和创作的高潮。与冯梦龙同时代的凌濛初第一个模仿《三言》的题材和体裁，编写出了《二拍》这两部拟话本小说集。

在《三言》中，到底哪些是宋元旧篇，哪些是明代拟话本作品，学者们曾对此问题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据郑振铎（《明清二代的平话集》，1957）考证，属于宋元的有36种，明60种，或元或明24种，这个数字与实际情况大致相符。陈辽（《〈三言〉中的明话本和明拟话本辨》，1988）后来指出，经过学者们的考证，《三言》中意见比较一致的宋元话本有41卷，具体篇目是：《喻》中的宋话本为第11、15、20、21、23、24、30、33卷，元话本为第4、12、25、26、35、36、38、39卷，宋元话本共16卷；《警》中的宋话本为第4、7、8、10、12、13、14、16、19、20、23、29、30、36、37、38、39卷，元话本为33卷，宋元话本共18卷；《醒》中的宋话本为第14、31、33卷，元话本为第6、13、17、23卷，宋元话本共7卷。陈辽还对其余79卷明代作品中的话本和拟话本做了区分（64~70页）。石麟、刘开田（《论“三言”的历史地位和作用》，1999）也对《三言》作品的归属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三言》中与宋元旧篇、明代前中期作品有干系的小说在49篇左右，约占《三言》总篇数的40%。不过他们同时也指出，这种统计并不是说冯梦龙与这几十篇作品无关，因为对上述作品，冯梦龙都做过或多或少的改造。

与学者们通常采用的文献学、文学的研究方法不同，在对待《三言》作品的归属问题上，日本汉学家佐藤晴彦（《对〈警世通言〉中冯梦龙作品的窥测——以语言学的角度看〈三言〉》，1992）另辟蹊径，采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给其中的作品断代。佐藤先生的断代标准不是难懂的特殊词，而是最普通的常用词汇、语法。这是因为，特殊词汇数量少，易被模仿，而常用词汇、语法却能真实地反映出时代差异。佐藤先生把罗贯中《平妖传》二十回本和冯梦龙增补的《平妖传》四十回本做过比较，找出冯梦龙语言运用上的特征，然后以此为基础来检验《三言》中哪些作品具有冯梦龙的语言特征（173~186页）。这是一种科学的断代方法。

尽管学者们在《三言》作品的归属问题上做了很多的研究，但意见还不尽一致。这种分歧的存在，是因为《三言》中所收的宋元话本，往往不是宋元话本的本来面目，而是经过明代人（包括冯梦龙）的加工和润色，这无疑增加了考证的困难。

至于《三言》中哪些是冯梦龙的作品，哪些不是，目前学术界的分歧更为严重，获得学术界一致公认的只有拟话本小说《老门生三世报恩》一篇。不过袁行云（《冯梦龙三言新证》，1980）却认为《三言》中有7篇拟话本是冯梦龙所作，欧阳代发（《“三言”中的冯梦龙作品》，1996）甚至认为其中只有46篇非冯梦龙作品，其余74篇均应视为他的作品。由于冯梦龙的生平历史不详，要找到考证其作品的确凿证据不易，所以上述学者的观点也只能是一家之言，还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

《三言》在明代天启元年（1621）至崇祯五年（1632）这12年间陆续出版，深受下层民众的欢迎，据缪咏禾（《冯梦龙和三言》，1979）介绍，《警世通言》在当时就有三种刻本：三桂堂王振华刻本、金陵兼善堂刻本、衍庆堂刻本，《醒世恒言》在当时有四种刻本：衍庆堂刻本两种、叶敬池刻本、叶敬溪刻本（79页）。然而《三言》的流传可谓命途多舛。据《苏州府志·风俗》附录《汤文正公抚吴告谕》：“编刻淫词小说戏曲坏乱人心伤败风俗者”必须“将书板立行焚毁”。由于《三言》被认为是“淫词小说”，故在清兵入关之时便被清朝禁毁，从此散佚民间，流失海外。这以后的两百年里，冯梦龙的名字几乎完全为国人所遗忘，甚至到鲁迅编撰《中国小说史略》时，他也仅见到《醒世恒言》一种。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中写道：“‘三言’云者，一曰《喻世明言》，二曰《警世通言》，今皆未见，仅知其序目。”这是因为当时《三言》在国内还没有公开出版发行，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倡导平民文学，《三言》才逐渐浮出水面。首先在国内发现了《警世通言》，